

“双百”方针提出的文学环境及影响

李建东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双百”方针是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解冻”、国内文学状况不甚理想的前提下由毛泽东所提出来的,旨在推进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但在之后的具体实行中,却发生了一些偏颇,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百花”时期的文学繁荣现象,虽然短暂,却证明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关键词:“双百”方针;背景;反思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43-05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20世纪50年代“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人们研究的一个重点。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当时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解冻”的普遍性现象,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思想意识上进行改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表示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1]。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从建立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思路出发,于1956年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文学环境

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他的浪漫情怀与不拘一格的政治抱负是紧密相连的。在艺术领域里,他希望艺术审美具有自由奔放和辽阔广袤的创作空间。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过“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这是“双百”方针的思想理论根据。以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56年是思考的年代、转折的年代。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1956年以前,意

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关于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批判等事件。由于连续几次规模很大的批判唯心论的运动,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小心谨慎。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销声匿迹了,创作和评论显得刻板沉寂。这既表现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面,也反映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度上面。对这种不敢写和写得不好的情况,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同工商界的一次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印度的电影片一星期有好几百万人看,我们自己的片子则很少人看,这就是人们以不看的方式来批评,因为没有味道,引不起兴趣。做得不好,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文艺中形式主义是弱点,千篇一律不好,要以实际情况出发,要入情入理。”^[2]^[38]在国际上,当时苏联的变革,也对中国形势产生一定影响。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基本上结束了对文化领域进行严酷控制的“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恢复名誉。其中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的发表,是一个重要事件。这个“写了爱情和个人幸福的问题”的小说,其标题就“成了整个这段时期的象征”。尽管它并非一篇杰作,“然而被成千上万的读者争相传阅。这是因为该作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暴力统治之后,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气候。”^[3]中国的文学气候可能没有那么严酷,但频繁的政治与文艺批判运动,也确

收稿日期:2011-01-06

作者简介:李建东(1958-),男,山西晋城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艺学。

实使许多作家心有余悸,而谨小慎微。

早在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问题的争论又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当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分期有不同看法,中宣部还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让陈伯达任主任,陈伯达向他请示研究方针,他回答说:“百家争鸣”^{[2]386}。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双百”方针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方针。他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党中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的发展科学和艺术工作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全面的阐述。至此,“双百”方针开始向全国,特别是文化艺术界进行传达和推广。

“双百”方针虽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却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在当时,一方面,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是不相适应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4]。这就为“双百”方针的提出谱定了一个有力的政治基调。

正因此,中共中央在全国文化界的权威发言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释了党的“双百”方针。他说:“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

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来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室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5]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也已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总题目^[6]。科学与文学艺术领域,则是这一总题目下的分题目。因此,对于科学与文学艺术领域的考虑,就是对整个社会形态与社会矛盾的总体考虑,是我党政治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百花”时期

“双百”方针的基本含义,根据毛泽东的解释,就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7]“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是促进文艺繁荣的方法。其精神实质在于按文艺规律发展文艺,在自由竞赛中使文艺的各种形式和风格都得到充分发展,真正发扬艺术民主。其内容从主要方面讲是指文艺创作自由,包括提倡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提倡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提倡创作方法的自由运用和主张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双百”方针中的“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方法。其精神实质就是在学术问题上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其基本内容就是鼓励文艺界科学界对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自由争辩,切实实行民主讨论,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学术问题上明辨是非,发展真理^[6]。总之,“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党中央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种信心。它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4]从而给广大作家

们带来了新的创作激情,给文坛吹进了清新的风。

从1956年5月“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7月“反右”斗争的全面展开,这一年零两个月时间,被称为“百花时代”。在“百花时代”,确实是许多作家最为心情舒畅、跃跃欲试的季节。过去心里敢想而不敢说、抑或连想也不敢想的问题,此时也敢于畅所欲言。一进入1956年,就感到气候协调温和了许多。在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讨论会上,康濯等一些作家就直言不讳地把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作为当前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以引起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关注。正是在这样一种温和的气候下,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能够以正确的心态,看待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并能平静地认识到现实生活比作品里再现出来的生活还要严峻酷烈得多。不论这种心态是否切合时宜,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已准备重展歌喉。这时期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老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正视文坛现实,而且能够对这些不理想的现实发出自己真诚的声音。臧克家也在呼唤着老诗人的奋起,他在一次作协理事会上,一连提到了“大堰河”的儿子艾青、“擂鼓的诗人”田间,以及过去在诗创作方面有过很多贡献的冯至、袁水拍、何其芳等诗人的名字,指出他们诗歌创作的衰退。其实感叹“我们诗的声音显得太微弱”的臧克家,自己也何尝不如此呢?这一衰退现象针对建国前已具有相当影响的老作家来说,确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也许正因此,双百方针的提出,使得许多作家、理论家积极地予以响应,他们畅所欲言、直陈己见,以一颗真诚的心准备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美学家朱光潜在当时就著文,以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他检讨自己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没有写一篇学术性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者是就美学里的某个问题认真地做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他不愿,而是由于他不敢。并且将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成他们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老作家、老学者的“福音”。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学者也是如此。钱谷融在后来回忆到:“如果不是在那时刚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但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8]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下,才有可能展开对“现实主义”这一敏感话题的大讨论。比较重要

的文章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上的,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上的,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发表于《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上的,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发表于《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上的,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发表于《文艺报》1957年第5期上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于《新港》1957年第1期上的,巴人《论人情》;发表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上的,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等。

在被称为文学“蜜月期”的“百花”时代,给广大作家,特别是那些为共和国诞生曾经进行过浴血的革命斗争,并在革命斗争中获得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生活原则,也接受了有关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与图景的年轻作家,所带来的决不是打破束缚,解放自由的狂欢,而是以对党对事业的更加热诚、希望党和革命事业更加纯洁而健康地发展的美好祝愿,来注视并揭示任何不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纯洁而健康发展的黑暗或灰暗的东西的。一时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于《人民文学》和各地文学刊物上,纷纷发表了在思想、艺术上特别在题材上,对此前人为设置的“禁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突破的作品。比较典型的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党内官僚主义、意志消沉等黑暗面的突破;宗璞的《红豆》——对“爱情”禁区的突破;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对“妓女的新生活”等“另类”题材的突破等。而且三篇小说都有着强烈的“歌颂”的因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歌颂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维护党的方针利益和尊严的炽热感情和青春朝气;《红豆》歌颂了热爱祖国、向往革命和事业的“大爱”;《小巷深处》则歌颂了战胜世俗偏见的真诚的爱情。尽管如此,它们后来仍然遭到各种名目的批判。以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为典型,也最能说明问题。批判者的理论根据只是王蒙笔下的官僚主义是极少数的,而不是普遍的。他们又在假设中认定,即使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干部衰退现象到处是,也只会出现在离开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而不会出现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这种带着某种“肯定性”的批判,表现了与作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而是如何去概括“典型”及在技法上的不同观点罢了。其深层所在,仍然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尽管“暴露”的

内容是真实的、不影响大局的、善意的。

三、影响与反思

一般认为,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是全国“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也标志着“百花文学”时期的结束。随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刘宾雁、王蒙、秦兆阳、刘绍棠等等大批作家被划定为“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中称:到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极右分子1257人。北京各高校中,右派分子4230人。教授中右派分子192人(其中极右分子85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8%。这只是“反右”运动1月以后仅限北京市的情况。而全国划定右派的人数要多得多,据官方统计为552877人。如将各省统计数字相加将有百万,因为有些人被划成右派,却未装档案^[9]。这些只是一些抽象的数字,但数字背后的苦难,则成为后来诸多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另一番悲壮的世界。

“反右”运动之后的1958年,是我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年份。在文学上的标志是配合“左倾”激进方针的新民歌运动,也是一场为了配合“大跃进”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一年,河北省委拟定1000万篇群众写作计划;山西提出一年要产生三十万“李有才”、三十万“郭兰英”;甘肃计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2000名作家、三年10000名作家。而这些群众作家们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还没有进过学校的门^[10]。可以说,这一运动是“左倾”“浮夸风”的文学再现。之后,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是这一运动的“集萃”。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反思那样一个刚刚过去不太久远的历史,“双百”方针所提出的初衷是好的。党和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科学论述和“双百”方针的实施,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揭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管理文艺事业的新篇章。“双百”方针之所以能在1956年提出,最根本原因就是党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清醒的估计,顺应了历史转折的要求,把主要注意力从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转移到搞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正是在“八大”政治路线的指引下,一段时间内,文艺乃

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后来“八大”路线逐渐遭到破坏,“双百”方针也随之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了。^[6]“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1961年、1962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了严重破坏。”^[4]导致史无前例的文化沙漠的后果。

我们知道,“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的文艺经历了三个比较繁荣的时期。一是从1956年提出到反右派运动开始,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思想理论战线比较活跃。二是“文革”前的1964年前后,当时国家从三年困难中走过来,经济形势好转,经过反右运动,激烈的政治斗争也过去几年,所以大家心情比较舒畅,气氛比较活跃。三是“文革”后的一段时间,经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出现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但总的看来,从口号提出到新时期文学的20余年来,“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够理想,因为“双百”方针的贯彻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保证,而这种环境不断地被破坏,不断地受到干扰。特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动不动就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百家争鸣是无法开展的^[6]。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文革”时期,文化问题虽然受到中央的重视,虽然屡经运动,又屡经调整,却仍未达到理想状态的重要原因。

半个世纪过去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始终伴随着“左”倾路线与思想的干扰,除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外,并未能真正贯彻下去。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的同志没有抓住或不承认“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来求得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11]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就对文学艺术有过精辟的论述,一再强调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其特征就是它的审美性;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方式是以充满审美与诗意的形象为中介的。因此,有必要保护文学艺术创造的自由,即想象与创作的自由。这两种“自由”通过文学艺术内部规律的协调,能够最终达到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促进与完

善作用。“双百”方针的提出,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条基本原则。遗憾的是在具体实行中,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制约,由于延续至整个“文革”时期的“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而未能贯彻始终。其问题的实质是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和处理文艺、学术问题,简单地把文艺和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严重混淆了政治与文艺的界限。历史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的提出,只能说有一个好的初衷,而未能圆满一个好的结局。这只能付诸于那个时代我国政治局势发展的

必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我们重温那一段历史,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同时可以帮助厘清这一阶段我国文学发展的状况。这对推进比较复杂的当代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特别是,1956至1957年“百花”时期那短暂而美好的文学繁荣现象,证明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贯彻到底罢了。

参考文献:

-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
- [2] 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3] 马·斯洛宁.解冻·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
- [4] 新华社电.“双百”方针的提出[N].人民日报,2009-08-27(5).
- [5]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N].人民日报,1956-06-16(2).
- [6] 贾丽云,李彦青.党的八大“双百”方针[J].理论教育与实践,1996(3):25-29.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8.
- [8] 钱谷融,殷国明.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9.
- [9] 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4-46.
- [10] 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39-340.
- [11] 胡乔木.当代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M].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9.

The History Background and Meaning that “Dual - Hundred” Guideline Put Forward

LI Jian-dong

(School of Libre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Mao Ze Dong puts forward “Dual - hundred” guideline at the premise of the “defrost” in the 50s socialism camp, and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ondition is not very ideal. This guideline is aim at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ism literature. But in the latter concrete actualizing, with the occurrence of some deviations, the guideline has not being exact carried through and performance. We need clear up this point in the teach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words: “Dual - hundred” guideline; background; introspec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